

# 大学语文

主编 李启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大学语文

Daxue Yuwen

主编 李启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内容提要

本书的编写以大学语文的“语文性”即“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为根本原则，采取“文体结构模式”，分为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学术、应用六个单元，具有民族性视野、当代性视野、国际性视野相融合的鲜明特点。文学类选文追求经典性、审美性、新颖性、独创性，学术类、应用类选文注重典型性、代表性、规范性、实用性。各单元的“概述”力求全面准确，各篇的“赏析提示”力求言简意赅，“拓展阅读文献”为读者深入钻研、理解文本提供参考文献，“思考练习”为读者发掘文本人文内涵、写作技巧、语言特点及进行文体写作训练提供帮助。

本书可作为普通高校通识课教材，也适合其他读者阅读。既可以作为文学读本进行鉴赏，又可以为学术写作、应用写作训练提供帮助。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大学语文 / 李启军主编. -- 北京 :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7-04-043811-6

I. ①大… II. ①李… III. ①大学语文课 - 高等学校 - 教材 IV. ①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5347号

|          |          |          |          |
|----------|----------|----------|----------|
| 策划编辑 吴 军 | 责任编辑 吴 军 | 封面设计 钟 雨 | 版式设计 王艳红 |
| 责任校对 吕红颖 | 责任印制 刘思涵 |          |          |

|      |                     |      |                                                                       |
|------|---------------------|------|-----------------------------------------------------------------------|
| 出版发行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咨询电话 | 400-810-0598                                                          |
| 社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 网 址  | <a href="http://www.hep.edu.cn">http://www.hep.edu.cn</a>             |
| 邮政编码 | 100120              |      | <a href="http://www.hep.com.cn">http://www.hep.com.cn</a>             |
| 印 刷  | 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 网上订购 | <a href="http://www.landracom.com">http://www.landracom.com</a>       |
| 开 本  | 787 mm×1092 mm 1/16 |      | <a href="http://www.landracom.com.cn">http://www.landracom.com.cn</a> |
| 印 张  | 26.25               |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
| 字 数  | 620 千字              | 印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 购书热线 | 010-58581118        | 定 价  | 36.8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 料 号 43811-00

主 编:李启军

编 委(按拼音排序):

|     |     |     |     |     |
|-----|-----|-----|-----|-----|
| 蔡勇庆 | 陈成才 | 董迎春 | 何山燕 | 黄加玉 |
| 黄可兴 | 蒋美荣 | 康忠德 | 雷晓臻 | 李谟润 |
| 李燕玲 | 李宗宏 | 刘春梅 | 刘子凝 | 卢柳媚 |
| 吕晓燕 | 蒙银菊 | 覃 才 | 丘 冬 | 石丽芳 |
| 石天飞 | 王 君 | 王扬真 | 王宇慧 | 颜色星 |
| 于 婷 | 张 蕾 | 赵民威 | 钟乃元 | 周 婕 |
| 朱厚刚 |     |     |     |     |

# 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新理念

## ——《大学语文》主编的话

李启军

大学语文在当今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要走出困境,需要从学科定位、教材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法改革等各方面作出努力,而首要的应该是体现科学的学科定位的教材建设,因为“‘教什么’永远是语文教学的首位和本位”<sup>①</sup>。

大学语文是“高校素质教育课”固然不错,但是并不准确,因为素质教育课不只是大学语文,艺术鉴赏类课程都是素质教育课,笼统地说大学语文是高校素质教育课,其学科定位模糊不清。大学语文是人文素质教育课大体也不错,但还是定位不明晰,因为一方面承担人文素质教育的不仅仅是“大学语文”课,另一方面仅仅“大学语文”课也很难独立承担人文素质教育的重担。大学语文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其实课程名称已经标示得很清楚,“大学语文”就是语文课,就是大学阶段的语文课。

现在,有人呼唤中小学语文教学“回归语文”,我认为尤其需要呼唤大学语文“回归语文”。大学语文亟须回到“本色语文”“自然语文”的正道上,因为大学语文迷失自我的语文本性已经太久了。

### 一、语文与语文性

什么是语文?即使是教了一辈子语文的老师也未必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真要问起来,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说出像样的答案来。

语文教育家叶圣陶曾给语文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一九四九年改用‘语文’这个名称,因为这门功课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的。既然是运用语言的本领的,为什么不叫‘语言’呢?口头说的是‘语’,笔下写的是‘文’,二者手段不同,其实是一回事。功课不叫‘语言’而叫‘语文’,表明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都要在这门功课里学习的意思。”<sup>②</sup>

的确,语文课不能叫语言课,因为语文是语和文两个方面的结合。语就是语言,无论是口头说的还是书面写的,尚不成文的语言都是“语”;文,则不是一般的语言,而是已经按照某种规则结构起来的语言篇章,也就是文章。文章包含文学,但不限于文学。

叶圣陶的定义告诉我们,“语文”简单地说就是“语+文”。但是,对“语”和“文”又有不同理

① 李振华:《“教什么”永远是语文教学的首位和本位》,《小学教学参考》2014年第7期。

② 叶圣陶:《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19页。

解。在叶圣陶先生那里,“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其实,无论语还是文,都可作狭义、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语就是口头语,广义的语则既指口头语又指书面语;狭义的文就是文学,广义的文则既是文学又包含文学之外的其他文章。我的理解是,语既是口头语也是书面语,文既是文学也是其他文章。语文是语+文,又不是简单的语+文,因为语在文中,文在语中,语和文难解难分,准确说应该是“语之文”+“文之语”。语文学习和语文实践都是综合性的,既不能单纯学习语,也不能单纯学习文,而是既要在语中学文,又要在文中学语,即既要在口头语和书面语中学习口头和书面的文学、文章,又要在口头与书面的文学、文章中学习口头语和书面语。也就是说,在我看来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结构成的整体是文,文不断拆分开来就是语。这样一来,语文的任务就不是单纯“学习运用语言的本领”了,而是“学习语言以及运用语言构成文章的本领”。

叶圣陶的核心思想虽然是把口头语言看作“语”,把书面语言看作“文”,但是文章也是包含在他说的“文”之中的。他说:“当时想法,口头为语,笔下为文,合成一词,就称‘语文’。自此推想,似以语言文章为较切。文谓文字,似指一个个的字,不甚惬当。文谓文学,又不能包容文学以外之文章。”<sup>①</sup>问题是书面语言与文章是不能简单画上等号的,就如口头语言不能与口述文章画等号一样,说出的或写下的一个个字、一句句话、一个个句群是语言,但不是文章,文章是相对完整的结构化的语言篇章。

奇妙的是,语变成文,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尽管文拆分开来仍是语,但作为整体的文呈现给我们的不只是语,还有意——即语言所言说的东西。所以,文学是语言艺术,又不仅仅是语言艺术,而是一种人文性的语言艺术。文学是充满生命情怀、人生感悟、人文关怀的语言艺术,是一种言意化合体。文章也是一种言意化合体,只是文学之外的文章之意,有别于文学之意罢了。文学之意主要是带有含混性的意味、意义,文章之意则是较为单一、明确的意思。有人将文学看作纯粹的语言艺术,对其丰富深刻的人文内涵视而不见,试图仅仅从语言运用方面所具艺术性的高低来评判文学水平和价值的高低,那是不现实的。同样,非文学性的文章讲究特定的格式等形式规范,但其具有鲜明及物性特征的内容更不可忽视。

教育部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语言文字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sup>②</sup>《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将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概括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对语文学科性质的准确把握。过去的提法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相”字似乎暗示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可以分离的,未必是始终紧密联系在一起。将“相”改为“的”意味着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不管人们意识没意识到,语文总是既具有工具性又具有人文性的。

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无论语还是文都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工具性不言自明,人文性却很复杂。按我的理解,人文就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特征,诸如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命运、人的心性、

① 叶圣陶:《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开明出版社1989年版。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

人的理想、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人的感悟、人的生活及其意义,等等。语文,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说语文是一种交际和传播工具,又不仅仅是交际和传播工具,也是人之为人的文化特征所在。

首先,“语”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语言不仅“表现”或“反映”意义,而且语言“生产”意义。一方面,语言“表现”意义,说明语言是工具性的。另一方面,语言又“生产”意义,“我说故我在”,人存在于语言中,语言是“存在的家”,语言成了人之为人的确证,至于语言的创造和发展演变又总是与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生活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语言又具有深刻的人文性。

其次,“文”也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由特定民族语言结构而成的个性化的文学和标准化的文章,一方面是文化和文明传承的工具,另一方面反映了文学创作者个体的心性、情趣和文章撰写者对规制的遵守等,而且反映出其所属民族、地域、时代甚至整个人类共通的某些文化特性,明显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优秀的文学作品之所以特别能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往往一方面是因为“文之语”透出的魅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语之文”对人的命运等的深刻揭示,让人玩味无穷。文学之外的文章虽然较难反映出撰写者个人的心性、气质等个性化的东西,但其规范化的语言和格式恰恰较能反映某种体制化的行为隐含的某种集体无意识,如文章语言和格式体现出的等级结构关系。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本来是天然地融合为一体的,或者说其“工具性、人文性是水乳交融的、互为表里的”<sup>①</sup>。语文就是“语之文”与“文之语”的结合与统一,“语”“文”关系相当于“言”“意”关系,庄子说“得意而忘言”,语文教学却应该既“得文”又“得语”,两者不可偏废。从语言文字入手引导学生理解语言文字本身具有的文化意义以及语言文字构成的文学与别的文章具有的思想、感情、审美意味等,那就是“得文”;引导学生理解这些思想、感情、审美意味等是怎样通过语言文字表现出来的,引导学生在“得文”之后又回过头来分析其语言文字的运用、品味其语言文字的巧妙、揣摩其语言文字的表现力,这就是“得语”。“人文精神渗透在语文之中,教师只有引导学生认真揣摩作品的语言,与作品、作者进行精神的对话、心灵的交流,课文里的人文精神才会内化为学生自身的精神营养。可见,‘渗透’是语文教学中进行人文精神教育的必由之路。”<sup>②</sup>

以健康的语文课堂教学为主体的健康语文生活,本不应该在以工具性为主还是以人文性为主之间产生纠结。健康的语文课堂教学应该在结合恰当的课文教学中,既让学生学会字、词、句、段、篇等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运用,即掌握语文这个工具,又让学生深刻领会课文中字、词、句、段、篇在具体语境中呈现出来的丰富复杂或相对确定的意义;同时也强化教师本人对字、词、句、段、篇如何运用及如何发掘其深刻意义的认识。真正语文意义上的教学相长,也应该是从语文使用的工具性与语文意义的人文性两个层面体现出来。

① 魏本亚、尹逊才:《小学语文课改十年的问题与反思——对话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崔峦》,《语文建设》2011年第3期。

② 周文叶:《语文课改方向新探》,《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然而,我国的语文课程教学曾经出现过两种偏离:一种是唯工具论的偏离,另一种是唯人文论的偏离。唯工具论者只看到语文的工具性,看不到语文的人文性,这是语文性质的一种偏离。

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被称为工具论的发起者,因为他们曾明确提出过“工具论”和“应世论”。如叶圣陶说过国文教学“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sup>①</sup>。张志公说语文教学教人“能读一般应用的书籍报刊,在语文方面没有障碍”,“能写一般应用的文章,在语文方面没有显著的毛病”<sup>②</sup>。如果只是说语文是一种工具,学习语文可以“应付生活”之需,并不否定语文的人文性、综合实践性等,本来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将“语文”压缩到语言,且只看到语言的工具性,不能同时又从本体论意义上去看语言,不能理解语言既是工具又是“存在的家”,那就片面化和绝对化了,陷入了谬误。如有人就坚持认为“‘语文’就是语言,语文学科的所谓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三要素构成的、用以思维和交际的工具系统”<sup>③</sup>。有人更是批判在语文教学中重视文学、凸显人文的主张,断言“语文应该是一门纯技术的课程,跟数学一样,是一种解释、分析事物的工具和手段”<sup>④</sup>。这种极端的工具论,无疑是对语文性质的严重偏离。

至于在“应世论”上发展出来的“应试论”,将语文看作应试工具,就更是语文性质的极端扭曲了。有人指出“应试论”根源于“应世论”:“‘应试’,本来就是‘应世’的题内之意。‘应试’与‘应世’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对于学生来说,‘应试’就是最大的‘应世’。只有‘应试’好了,将来才能很好地‘应世’。这就是长期以来应试教育甚嚣尘上、素养教育备受挤压的原因。”<sup>⑤</sup>受“应试论”魔咒的禁锢,很多语文老师的语文教学“只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的语言技能和技巧,或者退一步,掌握应试的技巧而成为一门技术性的学科”<sup>⑥</sup>。语文本来应该让学生在玩味文学那生动美妙的语言和丰富奇妙的想象中得到审美享受的,但是被机械、死板的“教书匠”那公式化、教条化、抽象化、绝对化、简单化的教学肢解得体无完肤、面目全非、毫无生趣、味同嚼蜡,叫人好生厌烦。老师们自己缺乏敏感、活跃、灵动的心性,不能触摸到作家的人生体验、感受和沉思也就罢了,问题是将学生们敏感、活跃、灵动的心性也彻底扼杀了,破坏了学生们的正常感觉系统,患上了神经官能症,变得愚笨麻木了。在一切从应试出发、为应试服务的语文课中,“文学教育在文学之上,建立了一套顽固、强大的阐释体系。它刻板、教条、贫乏、单一,它把我们与文学的联系隔开了,它取代了文学,在我们这个精神已经极度匮乏的社会里发挥着使其更为匮乏的作用”<sup>⑦</sup>。因为语文深陷于“荒谬绝伦的‘应试教育’”中,使人发出了“误尽苍生是语文”的哀叹<sup>⑧</sup>。

工具论者将生动而又蕴含丰富意义的语文教学变成了抽象的语言规则学习课,不仅将一篇篇充满人文气息的课文肢解成了一个死的字、一个个死的词、一个个死的句子、一个个死的段

① 叶圣陶:《认识国文教学》,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2页。

② 张志公:《漫谈语文教学》,《张志公自选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③ 殷铭荷、陈静:《呼唤科学的语文教育观》,《语文教学通讯》2004年第9期。

④ 颜福双:《语文就是语文》,《南方周末》2004年3月4日第23版。

⑤ 潘新和:《语文课改的出路表现与存在——试为写作教学难题把脉》,《江苏教育》2011年第4期。

⑥ 卞冬梅:《什么是健康的语文生活》,《名作欣赏》2013年第2期。

⑦ 薛毅:《文学教育的悲哀》,《北京文学》1997年第11期。

⑧ 参见洪周平:《误尽苍生——也谈语文教育》,《北京文学》1998年第3期。作者分析某些欲将学生“考焦、考傻”的烦琐荒唐的语文考题后,说“这是一件误尽天下苍生的大事”,而没有直接说“误尽苍生是语文”。

落,完整的活的文学或文章也变成了一具死尸。这样的语文被剥离了“文”,只剩了“语”。离开了“文”的“语”已不是“语文”中的“语”,而是死的“语”,这样的所谓“语文”有谁会喜欢呢?

2011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布后,有些学者和语文老师又发生了对语文性质理解的另一种偏离,片面强调语文的人文性而忽视了其工具性。完整统一的语文又被剥离了“语”只剩了“文”,离开了“语”的“文”已不是“语文”中的“文”,而成了宽泛无边的“文”,成了漂浮不定的“文”。如果语文课堂过于注重挖掘所谓的“人文内涵”,不从语言文字入手,“离开语言文字、离开文本去搞什么升华”,“对课文的思想内容穷追不舍”,还“美其名曰在人文性上深挖洞广积粮”<sup>①</sup>,其实,这变成了人文性的“金鸡独立”。这样,就有可能“把语文课上成了生活常识课、思想方法课、自然科学课、数学课、物理课、历史课、地理课、经济课,或者任何什么别的课,但就是不是语文课”<sup>②</sup>。中小学语文课改之初,许多老师的所谓语文课就走入了这样的误区。

人文性内涵的呈现方式是广泛多样的。就语文课而言,它可以在语言文字的解释中体现出来,也可以在文学以及其他文章的解读中体现出来。就课程教学而言,它可以在语文课教学中体现出来,也可以在思想品德课、历史课、政治课以及其他各种文化专题课教学中体现出来。语文课的人文性不能离开语文的本体——语言文字的解释和作为课文的文学以及其他文章的解读,去漫无边际地“挖掘”“升华”“延伸”。语文课中的人文性是具有“语文边界”的,只能是“语文理解”中的人文性,语文的人文性不能越出语文的边界,只能锁定在“语文性质”“语文价值”“语文层次”“语文结构”的范围内<sup>③</sup>。也就是说,语文课的人文性应该在结合课文中具体语言文字的分析以及课文题材、立意与结构等的分析见出。而不必为突出人文性,刻意按照人文主题编排单元并组织课文。

20世纪60年代,叶圣陶先生曾批评说:“时下颇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把内容相类似的古今现成文章几篇合成一组,题材关于家庭的合在一处,题材关于爱国的合在一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科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科的立场,我们未敢赞同。”<sup>④</sup>但是,语文新课改以来,一些人认为叶圣陶们错了,错就错在突出了语文的工具性而忽视了其人文性,现在到了突出语文的人文性的时候了,于是一些语文教材又回到了叶圣陶先生曾经批评过的那种编法,如以“青春”“经济”等为主题选择文章,组成单元,让人感觉“它们的着眼点,都不在语文,而是语文之外的什么东西”<sup>⑤</sup>。

一些崇尚“教法主义”的所谓语文课更是将语文课上成了娱乐课,课堂上学生们又唱又跳,热闹得很,可就是埋没甚至失落了“语文”的内容。这样的语文课堂,借用一位老师的比喻就是“上课就像放鞭炮,学生就像一个个点燃的小鞭炮,噼噼啪啪一阵乱放”<sup>⑥</sup>,真所谓是“热热闹闹走

① 魏本亚、尹逊才:《小学语文课改十年的问题与反思——对话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崔峦》,《语文建设》2011年第3期。

② 周文叶:《语文课改方向新探》,《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③ 栾雪梅:《知识的语文边界:什么才是语文的理解》,《小学语文教学》2007年第6期。

④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五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05页。

⑤ 周文叶:《语文课改方向新探》,《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⑥ 蔡茉莉:《语文课改实践中的偏误试析》,《教育评论》2004年第2期。

过场,高高兴兴搞形式”<sup>①</sup>。这样的语文课堂教学其有效性不能不遭到质疑,“回归语文”以及回到“本色语文”“自然语文”的声音就是在这样的质疑中发出来的。

## 二、大学语文的百年迷误

追述起来,我国在大学开设语文课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

早在1912年,我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就开设了“诸子”“经学大义”“作文”等带有语文性质的一些课程。五四时期倡导“言文合一”的国语教育,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1920年在《国民学校令施行细则》中将“国文科”改为“国语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高等院校普遍开设公共必修课“大一国文”课程。国民政府教育部1929年8月颁行的《大学规程》第8条明确规定:“大学院及独立学院各科党义、国文、体育、军事训练及第一、二外国语为公共必修科目。”<sup>②</sup>“大一国文”作为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必修课一直开设到全国大学院系大调整的1952年,此后因追慕苏联所谓专业化大学体制,绝大多数院校停开此课,尽管台湾的高等院校仍在延续“大一国文”的辉煌<sup>③</sup>。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倡议重开“大学语文”并在南京大学首先开设,全国高校普遍恢复开设大学语文的历史又已经走过30多年。

但是,一百多年来,大学语文的编著者们竟然普遍讳言大学语文作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语文性”。如果说中小学语文对“语文性”的偏离以语文新课改为分水岭,之前是重视工具性轻视人文性,之后是重视人文性轻视工具性,那么大学语文则一直是偏于人文性轻于工具性,现在渐渐趋于“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完整“语文性”。

有人说“当施教对象已升为大学生,他们大多都有自身的思维能力、知识储备以及社会意识,因此针对大学生群体所开设的语文课程已不再是字面上的‘语文’之意,而已升级为人文意义范畴”<sup>④</sup>,这种认识可以看作大学语文的百年迷误。如果大学生们的语文知识、语文能力等问题已经解决,那还有必要再开设大学语文吗?如果大学阶段开设的语文课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语文课,那还有必要叫“大学语文”吗?既然大学生们需要解决的是人文精神匮乏的问题,需要帮助大学生们“精神成人”,那就应该直接开设人文精神教育课。开设的是语文课,却不要完整的语文性,只要人文性,那不被疑为脑子进水了才怪!

20世纪初出现的“国文”教育是文言文的阅读与写作训练。在出现了白话文运动的背景下,文言文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性越来越减弱以至于最终会消失,这时强调文言文的阅读与写作,显然不是着眼于其“应用性”,而是着眼于其文化性——其承载的一定传统文化精神,这也是当时知识分子所认识到的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特殊人文性的重要方面。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课程的价值取向基本以国学为主”,“无论是《诗经》、《楚辞》、《文选》,还是历史要籍《左传》、《史

① 吴章贵:《当前语文课改中两个突出的问题》,《语文教学通讯》2004年第36期。

② 徐中玉、齐森华主编:《大学语文·编写说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③ 《语文建设》2012年第17期发表的陈平原《“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一文说:“为全校学生开设‘大一国文’,这本是老北大的传统,傅斯年将其带到了台湾,至今仍枝繁叶茂。最近十多年,台湾大学校方曾做过多次全校性教学评鉴,‘大一国文’平均值遥遥领先其他科目,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共同必修课。”

④ 彭文忠:《基于通识教育的大学语文教育之功能定位及其实践》,《文史博览》(理论)2013年第10期。

通》等,甚至于唐诗宋词,都是以儒家文化的经典为基本框架,加上先秦诸子,就构成了较完整的国学知识谱系”<sup>①</sup>。“国学”是中国人应该具有的一种人文素养。

当年匡亚明校长倡议重开“大学语文”,虽然既看到其人文性,又看到其工具性,但是更重视其人文性。他说“大学里开设大学语文课,意义重大”,具体说“意义”有二:其一,因为语文是教人掌握语言的,而语言是一种武器;其二,“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语文教师的任务不光在于传授语文知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教材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在这两大意义之间,何者更重要呢?他明确说:“语文教师要兼有语言文字、散文、诗歌之长,不仅能提高学生的欣赏能力,而且能提高学生的表达能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高尚的意志、理想和情操。”<sup>②</sup>“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高尚的意志、理想和情操”无疑是人文精神,而且往往是受政治意识形态规训的人文精神。徐中玉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大学语文教材,可以说很好地体现了这种“价值取向”。教材共收录从先秦到现代的98篇作品,其中古代文学部分91篇,现代文学作品仅7篇,根本不选用外国文学作品。

21世纪出现了几部被称为颇具特色的大学语文教材,如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张介明、彭少健主编的《比较大学语文》(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年版),尚永亮主编的《大学语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它们共同的“特色”主要是什么呢?简单地说,不是别的,恰恰是更加突出的人文性,以至于将人文性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且让我们抽出几本教材简单分析一下。

温儒敏主编的《高等语文》设计了“《诗经》与中国诗歌的起源”“《离骚》与‘骚’的传统”“《易》与中国古代神秘文化”“《九章算术》与中国古代数学”等25个文学艺术以及文化专题,其专题的设计为的是“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加深学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理解”,也的确是“大胆新颖”的,但是它是否考虑了“教材设计的实现可能及难度”呢?其一些专题是否“偏离了语文的范畴”?是否让大学语文“承载过多的义务”了?<sup>③</sup>是否符合温教授自己对大学语文的定位——“大学语文应当是一门适合当代大学生的、偏重语文素养培育的基础性课程”<sup>④</sup>?

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他自称是对“大学语文”的改良。它由“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四编组成。他希望他的大学文学课“把同学们引入世界民族古代与现代思想文化的宝库,与百年之远、万仞之遥的大师巨匠,与古代最出色的哲学家、历史

① 董奇峰:《从“大一国文”到“大学文学”——“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目标、学习内容的演变浅探》,《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② 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序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参看孟怀东:《大学语文变革之路——评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高等语文〉一书》,《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唐景莉:《大学语文:重在语文素养的培育——访山东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5日。

学家、文学家、军事家,与现代第一流的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进行心灵的交流,精神的对话”<sup>①</sup>。无论是他主编的《大学文学》,还是他主编的《新语文读本》,其愿望是给学生打好“精神的底子”。他说过,文学作品“都无一不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所以,他说的“精神的底子”就是人文精神的底子。因为他的语文观念特别强调人文精神的培养,他被人称为“新语文观念的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如何寻找‘精神的底子’与语文教育的有效结合点”,如何“使‘精神的底子’语文化,而新语文观念没有完成这个任务”<sup>②</sup>。

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按照青春、大学、仁爱、情恋、自由、良知、敬畏、乡愁、记忆、英雄、坚忍、希望、自我审视、反讽、诗意、自然 16 个主题词编排成 16 章,铸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与人文关怀意识,即帮助学生“精神成人”<sup>③</sup>。夏中义是希望用具有普世价值的“现代人文”精神来引导青年大学生成人,所选“经典诗文”自然也就不限于中国,更不限于中国古代,但是,如果刻意“凸显价值性,弱化知识性、工具性”,又如何体现大学语文的完整“语文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追求一种简明文学史的编法,以各时期、各文体的大流派、大家构成文学简史的“纲”,以所选各大流派、大家的具体作品构成各个“点”,“以点带面”,并且让大、中、小学时段所学名家名篇相互呼应,相互补充,联通贯穿为一体,呈现出一个中国文学发展的主要轨迹。该教材选录的全是中国文学作品,而且古代文学占绝对优势,除附录外,所选的 120 篇作品中现代作品只有 19 篇,古代作品 101 篇。所选确实是中国文学的名家名篇,但与其叫作“大学语文”,还不如叫作“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精选”,其所能承载的当然也是中国人文精神,尤其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

我国使用时间最长、修订版次最多、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的大学语文教材,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这本教材初版于 1981 年,1983 年修订二版、1985 年修订三版、1987 年修订四版,统称为“1981—1987 年本”,这四个版本的结构模式是一样的,可以叫做“文学史结构模式”。“1981—1987 年本”选文以中国文学为主,选文按照“先秦文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宋代文学”“元明清近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顺序进行分段,各段后面是该段文学的概述。每篇选文除了必要的注释外,还设计了几道思考与练习题。虽然初版仅收古代文学作品和少量现代文学作品,修订的二、三、四版收入了 8 篇外国文学作品,修订四版还增加了“读书和写作”单元。最后的“附录”原是常用语文工具书简介、诗词格律简释、古代汉语常用虚词例释、古代汉语的特殊句式、常用修辞格例释、我国历史朝代简表 6 篇,修订三版增加了常用应用文写作要点和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写作要点 2 篇,修订四版又增加了简化字总表 1 篇。总的说,这四个版本的《大学语文》虽是着眼于文学教学尤其是中国文学教学的,“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的意图很明显,但基本还是体现出了较完整的“语文性”的,而且“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的“语文性”越来越强,如选文后的注释、思考练习题以及不断丰富的附录,主

① 钱理群:《追求文理的融通——理科“大一语文”开场白》,《语文教育门外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6 页。

② 薛毅:《反思新语文观念》,《书城》2003 年第 11 期。

③ 夏中义:《不想把大学人文做成一个学科》,《中华读书报》2005 年 11 月 23 日。

要体现了语文的“工具性”，精选的典范文学作品内含的人文精神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则是其“人文性”。

1988年，徐中玉先生又主编了一本供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使用的教材——《公共课大学语文》。这本教材分为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小说、附录5个部分。各文类既有文选，也有文体知识介绍，这样既便于学生进行比较和练习同类文体写作，而且在每类文体后面，都有一篇文章简要说明这类文体的写作要点或鉴赏方法。其选文是按文体分类编排的，可以称为“文体结构模式”。在我看来，虽然将不在一个层面上的“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小说”生硬地并列在一起，乱而不全，显得很“不专业”，但这个结构模式是最能体现大学语文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语文性”的，可惜徐先生未能按照这个思路继续改进下去，后来他却转向了极能凸显“人文性霸权”的另一种模式。

从1996年开始，徐中玉与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采取了“人文精神结构模式”。其“编写说明”中不再有“提高语文能力”之类语言，而是将课程定位为“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作用，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营造大学里文化氛围的基础课程”，在罗列这门课程四个方面作用时，首先提及的就是“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教材内容分为9个单元，每个单元虽然没有标题，但根据各单元选文来判断，大体是按照人格修养、人生感受、爱国情怀、社会政治、亲情乡情、爱情婚姻、登临怀古、写景状物、谈艺论文9个人文主题编排的。选文主要是精美的诗文，篇幅较长的小说基本不收；只用中国作品，外国作品一概不要。每篇选文后的提示介绍选文的内容、主旨、特色以及启迪等。思考与练习主要着眼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提示和突出借鉴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强化人格修养的现实意义。这种编法注重学生文化修养和道德水平的提高，却忽视了语文知识的传授和写作能力的培养。徐中玉这本教材实质上带有向1981年初版的《大学语文》回归的意味。

如果说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1996年版《大学语文》还是一种隐形的“人文精神结构模式”，那么其2001年的增订本则经过改进，成为了旗帜鲜明的“人文精神结构模式”。其选文按照“品格·胸怀”“为政·爱国”“社会·人生”“人生·世态”“亲情·人生”“爱国·婚姻”“传记·逸事”“写景·记游”“怀古·咏史”“论文·品艺”“中国小说”“外国小说”主题编为12个单元。该教材增加了中外小说选文，表现出对大学生读者需要的某种尊重，但是将“中国小说”“外国小说”与“品格·胸怀”等10个主题并列在一起，又明显是非专业的眼光。他们在2005年出版的第八版，取消了专门的“中国小说”“外国小说”单元，按照12个人文主题编排选文，即以民为本、心怀天下、和而不同、品格修养、社会人生、人情世态、乡思亲情、爱情婚姻、人物风神、咏史怀古、写景记游、论学品艺12个单元，但是小说几乎又失去了在他们的教材中立足的机会。

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大学语文》2007年出版的第九版在坚持“人文精神结构模式”的同时，表现出兼顾语文的“工具性”的努力。内容上除了12个人文主题，即仁者爱人、和而不同、胸怀天下、浩然正气、冰雪肝胆、洞明世事、以史为鉴、故园情深、礼赞爱情、关爱生命、亲和自然、诗意人生，而且在第三、六、九、十二单元后增加了“记叙文的阅读与写作”“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诗歌的阅读与欣赏”“小说的阅读与欣赏”四个“学文例话”专题。2013年出版的第十版，仍然是上述12个人文主题，但调换了顺序，增强了单元选文与“学文例话”的对应性、关联性。“学文

例话”四则分别改成了“说理”“抒情”“叙事”“写人”。“仁者爱人”“和而不同”“以史为鉴”三个单元的选文偏于说理,所以在这三个单元后插入“学文例话(一)说理”;“胸怀天下”“故园情深”“礼赞爱情”三个单元的选文偏于抒情,所以在这三个单元后插入“学文例话(二)抒情”;“洞明世事”“亲和自然”“关爱生命”三个单元的选文偏于叙事,所以在这三个单元后插入“学文例话(三)叙事”;“浩然正气”“冰雪肝胆”“诗意人生”三个单元的选文多是直接记写人的事迹、精神、境界的,所以在这三个单元后插入“学文例话(四)写人”。看似简单的单元顺序调换,因为与后面的“学文例话”的对应性、关联性增强了,实际更加体现了“人文性”与“工具性”统一的“语文性”。

应该说徐中玉《大学语文》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版本,其所追求的“人文性”“工具性”的程度以及两者之间的统一程度都是有所不同的。最有可能实现人文性与工具性较完美统一的语文性的,应该是1988年本尝试的“文体结构模式”,遗憾的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开始呼唤人文性的声音日益高涨,促使徐中玉先生在后来的《大学语文》版本中转向了“唯人文性是尊”的“人文精神结构模式”。大学语文发展到只讲人文性不讲工具性的时候,也就不再成其为大学语文了,起码已经失落了完整的语文性。这样的所谓大学语文无论曾经被抬到怎样的高度,终究是没有什么生命力的。徐中玉先生不愧是一位智者,善于自我反思,勇于与时俱进,终于认识到大学语文只追求人文性的偏误,所以在其《大学语文》第九版、第十版中虽然还是以人文性为主导,但也注意兼顾工具性了。

可以想象,只要认识到大学语文在人文性和工具性两方面不可偏废,必须寻找到两者的平衡点,那么大学语文必然能够走出百年迷误,获得完整的语文性。

### 三、本教材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如果说徐中玉《大学语文》第十版还只是表现出寻求人文性与工具性之间平衡点的某种积极努力,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已经出现某些大学语文教材在处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平衡性方面做得更加出色呢?的确如此。比如,吴凌、吴畏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sup>①</sup>采取了徐中玉先生曾经尝试过但尚不完善的“文体结构模式”,全书内容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致用文体五个单元。徐中玉先生那里的“文体结构模式”,是按照论说文、记叙文、诗词曲赋、小说等类别来编排的,明显存在分类标准不统一,忽视现代致用文体的缺陷。也有人受此方法启发,按照描写、叙述、抒情、说明和议论等编排单元,如黄伟林主编的《大学语文》<sup>②</sup>,分类标准虽然统一了,但感觉还停留在中学语文的层次上。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吴凌、吴畏的《新编大学语文》是较好地的人文性与工具性结合起来了的一本大学语文教材,但是不尽完善,需要改进,于是,我们的《大学语文》采取了一种更加全面、完整、合理的“文体结构模式”,表现出一种新颖的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思维 and 理念,重新确立了当代大学语文的出发点与归宿点。

具体而言,我们的《大学语文》的出发点与归宿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sup>①</sup> 该书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sup>②</sup> 该书为广西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其一,当代大学语文必须尊重语文性,体现语文性,即必须追求“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过去人们对语文性的认识和理解一直存在偏误,要么偏重工具性,要么偏重人文性,两者始终没有实现较好的统一。我们的语文课曾一度游离课文具体语境,大讲特讲抽象的语言学知识,或者过分沉醉于字、词、句等语言成分的分析,或者离开具体的语言文字的运用去深挖什么主题思想、文化内涵等。工具论者将课文分解得支离破碎,失去了整体性、情感性、审美性,结果本来应该重视不同生命体验与感悟的语文课变成了抽象、僵化的语言学之类知识的传授。人文论者则抛开文章的具体语言文字表述等的感受和分析,一味地在人文思想、价值方面天马行空地延伸、扩展、深入,结果使得本来具有自己的学科和课程边界的语文课越出了边界,异常“任性”起来。笔者始终认为,“语文”的“语”即语言文字,它们既是最基本的表情达意的工具,本身又是文化,而且在具体运用中还会生成文化意义——诸如与运用者的学识、修养、性情以及民族文化心理等的深层关联;“语文”的“文”即语言文字形成的文章,它们既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传播文化和文明成果等的工具,本身又是文化,写文章更是文化行为。作为语文课,不管是大学阶段还是中小学阶段,都应该通过具体课文让学生领会这两个层面的工具性与人文性。

前面提到的一些大学语文教材有意识地按照人文话题来结构内容,这种做法首先是拿一个确定的人文主题来阉割作品内涵的丰富性,似乎一个作品的意蕴就是教材编写者框定的那个人文主题,其实它包含的思想情感可能是极为丰富复杂,难以“一言以蔽之”的。语文的人文性必然是内含于语文性之中的人文性,而不可能是与语言、文字、文章无关的人文性。所以,人文性必须渗透在整体的语文性中,而不应该特别把它指点出来。本教材所选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典范性和审美性,都蕴含着某种人文内涵,但我们没有按照一个个人文话题或主题来编排,而是通过“赏析提示”的方式告诉上课的师生要通过自己的阅读、分析、思考去发现和理解。

过分强调大学语文的人文性,甚至将人文性看作大学语文根本的、唯一的性质,一方面是让大学语文承受了不可承受之重——大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任务应该有一个课程群来共同承担,而不应该让大学语文独自承担,不应该仅仅寄希望于大学语文;另一方面又必然顾此失彼,使大学语文无法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帮助大学生扩充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享受语文生活。

其二,大学语文不是中学语文,更不是小学语文,它有自己的阶段性特征。现代科学一般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三个层级构成,语文学科相应的也有语文知识、语文智能和语文教育三个层面。语文知识系统涵盖语音知识、文字知识、词汇知识、语法知识、修辞知识、逻辑知识、文章知识、文学知识等,语文智能系统涵盖听知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演讲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想象能力、思维能力等,语文教育涵盖语音教学、文字教学、语法教学、文章教学、文学教学、听说训练、阅读训练、写作训练、思维训练、人文教育、审美教育等。从小学语文到中学语文再到大学语文,都应该包括这三个层面,但是三个阶段各有侧重。<sup>①</sup>

在我们看来,小学语文可能偏重语音知识、文字知识、词汇知识,中学语文偏重语法知识、修辞知识、逻辑知识,大学语文偏重文章知识、文学知识;小学语文可能偏重听知能力、观察能力、记忆能力,中学语文偏重演讲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大学语文偏重想象能力、思维能力;小学语

① 参看魏怡:《“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与教材编写》,《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文可能偏重语音教学、文字教学、听说训练,中学语文偏重语法教学、阅读训练、写作训练、思维训练,大学语文偏重文章教学、文学教学、人文教育、审美教育等。

本教材的编写尊重语文学习阶段性特点,采用文体结构模式,将内容分为诗歌篇、散文篇、小说篇、剧本篇、学术篇、应用篇,选文既重视文学类作品也重视实用类的学术文章、应用文章。文学类的四个部分精选若干篇具有经典性、审美性、新颖性、独创性、精练性的我国古代、现当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文学作品,非文学类的两个部分精选典型性、代表性、规范性、实用性的学术文章、应用文体进行分析、评价,为学生在研读中得到美感享受,进而学习写作各类文学作品、学术文章、应用文体提供参照。我们认为,大学语文既要培养大学生的专门化的文学文体知识、文学文体阅读欣赏能力和写作能力,也应该让大学生学习和掌握学术文章和各种应用文体的知识以及写作能力。所以,我们将文学类文体、学术类文体、应用类文体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而不是重文学类文体的学习轻学术类、应用类文体的学习,也不是将文学文体学习与实用文体学习分离开来。

其三,大学语文应该将阅读欣赏与写作训练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研读典范性的文学作品、学术文章和应用文体,不仅得到审美快感——如体验汉语言文字的美、文学技法的美、文学情怀的美以及各类文章形式规范的美,而且学会模仿范文学习文学类、学术类、应用类文体的写作。文体写作能力的培养和提升是建立在大量同类文体阅读欣赏的基础上的,读写不能分家。语文教学不能太机械,不能阅读是阅读写作是写作,井水不犯河水,到了作文课上才谈作文,那是很难培养和提升写作能力的。必须牢固树立“读写结合、读写贯通、以读促写”<sup>①</sup>的观念。正如叶圣陶所指出的:“然而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单说写作程度如何是没有根的,要有根,就得追问那比较难捉摸的阅读程度。”“多方面地讲求阅读方法也就是多方面地养成写作习惯。习惯渐渐养成,技术拙劣与思路不清的毛病自然渐渐减少,一直减到没有。所以说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得其法,阅读程度提高了,写作程度没有不提高的。”<sup>②</sup>阅读不仅是写作的基础,而且阅读本身也可以是目的,即构成阅读生活。所以,某类文体的写作训练应该从某类文体的阅读开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的《大学语文》从文学作品到实用文体都同样采用范文和示例分析的方式,做到体例的高度统一,而且是“读写结合、读写贯通、以读促写”观念的贯彻。

其四,大学语文的选文应该与时俱进,具有民族性、当代性、国际性。徐中玉《大学语文》从1981年的初版到2013年的第十版,时间上跨越了30年,虽然前后各版本的变化也体现出一定意义上的“与时俱进”,但是总体上看有点像小婆娘的裹脚,迈不开步子。其选文自始至终是重古代作品轻现代作品、重诗文轻小说和剧本、重中国作品轻外国作品、重汉族作品轻少数民族作品的,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闭眼不看世界,自我封闭。这样的选文规则,看似重视民族传统文化,其实连“民族性”也没有贯彻到底,因为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文学是多民族文学,汉民族文学成

① 魏本亚、尹逊才:《小学语文课改十年的问题与反思——对话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崔峦》,《语文建设》2011年第3期。

② 叶圣陶:《阅读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54—55页。

就不能代表其他民族的文学成就。而且,似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在古代已经形成并定型下来,与当今民族文化没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民族性”究竟有多大可信度?我们的《大学语文》不仅精选有历代汉民族文学作品,而且精选了一定比例的其他民族文学作品,试图从浅表的民族性走向深层的民族性。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始终存在“贵古贱今”的倾向,始终未能改变古代文学作品在选文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局面,似乎古代汉民族文学成就足以代替当代汉民族文学成就。不仅如此,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选文一直特别钟情带有典雅气质的诗文,与现代世俗生活联系比较紧密的小说和戏剧文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位置。至于外国文学作品,小说有时还被想起,诗歌、剧本之类几乎就没出现和存在过一样,可以忽略不计似的。这样的大学语文除了具有一种狭隘的民族性之外,当代性与国际性从何说起呢?其他几本也曾备受赞誉的大学语文教材存在同样的局限。

本教材的编写既突出中国本土的文学作品,又给予外国文学作品一定比例,既考虑欧美作家、作品,也关注亚洲作家、作品,既收入过去传统形式的经典作品,又积极吸纳当今发生新变的文学作品以及与当今生活紧密相关的实用文体新形式(如剧本中的影视剧本、学术文体、应用文体),既强调汉民族作品,也不忽视其他少数民族作品,尽可能通过选文反映古今中外各类文体的生成、生存、生长的大致生态。

我们是这样想的,也希望我们的《大学语文》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我们的想法。究竟是不是呢?期待读者诸君在使用后、阅读后给我们一个反馈。

2015年3月23日

于相思湖畔